国之殇

69年过去了，抗战的硝烟已然散去，但历史的记忆不可磨灭。勿忘历史，缅怀英烈，是我们赢得未来的重要基点。

□ 余 戈

研究滇西抗战十载，笔者曾十余次踏访腾冲、松山、龙陵等地，结识了落籍当地的很多远征军老兵，也常介绍内地的远征军老兵后人去那里寻访祖辈的征战足迹，在腾冲的国殇墓园祭奠英魂。

远征军烈士、36师108团营长杨运洪的孙子小杨从腾冲回来后，向我讲述了一件事：那天，他在腾冲城里买了一个大花圈，欲打车前往国殇墓园，但心里颇感踌躇，因为按他老家广东的风俗，出租车司机是会拒绝花圈上车的。但令他意外的是，当司机闻听他是远征军烈士后人，二话没说即帮他将花圈搬上了车。到墓园后，又坚决不收他的打车费，说：“这是我们腾冲人应尽的义务。”

在腾冲，这样的事情并不令人惊奇。1945年1月修建国殇墓园时，民国元老、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曾对腾冲民众深情地呼吁：安葬在这里的是为了光复腾冲而牺牲的英烈，我们腾冲人应该把他们当成祖先来供奉，世世代代都要铭记他们的功绩！

当时，腾冲城刚刚收复半年。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这座徐霞客笔下瑰丽、神奇的“极边第一城”已化为一片焦土，大部分民众流离失所无处栖身。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腾冲民众却投入了两桩他们认为非做不可的大事：一是收敛散落在故土上的抗日将士遗骸，修建国殇墓园；二是修筑中印公路八莫至腾冲段，让国际援华物资尽快输入国门。为此，地方募捐7500万元（国币），投入民夫数千，特别是在修建国殇墓园期间，每天都有民众志愿前来做义工，耆老妇孺也都参与到搬运砖石的劳作中，一如抗战前修筑中国的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那样。

1945年7月7日墓园竣工，民国元老于右任取楚辞《国殇》意境，题名为“国殇墓园”。全园占地面积53300平方米，主体建筑由大门、忠烈祠、烈士墓冢、纪念塔、东西展览厅等组成，园内遍布苍松翠柏，庄严肃穆。

腾冲，是1944年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的一个局部战场，另外两处惨战之地是松山、龙陵，三地比邻，构成一个大三角形。1942年5月，我第一次入缅远征军作战失利，日军自缅甸经畹町攻入滇西，怒江以西的大片国土沦陷。此后远征军重建，在以史迪威将军为代表的美国盟军有力支持下，经过换装美式装备和全面整训，于1944年5月11日渡过怒江开始大反攻。担负腾冲方向作战的，是霍揆彰、周福成、阙汉骞等将领指挥的第20集团军的五万官兵。经过“二战海拔最高的战场”——高黎贡山之战、腾冲外围战、围城攻坚之战，浴血激战127天，歼灭日军“腾越守备队”3000余人，我军付出伤亡近1.9万人、阵亡9117人的惨重代价，终于收复腾冲。

在滇西大反攻的松山、龙陵等战场，远征军第11集团军和第8军也付出了同样惨重的代价：龙陵会战阵亡官兵1.7万余人，方圆十余平方公里的小小松山，亦伤亡官兵7763人、阵亡4000人。战后，这两地也像腾冲一样修筑了安葬英烈的国殇墓园。遗憾的是，在后来“大跃进”“文革”等运动中，这两处墓园均遭彻底毁坏，且因史料失散而难以重修。相比之下，腾冲国殇墓园比较幸运，虽然也曾遭严重破坏，但昔日纪念设施设计图纸和大部分阵亡将士资料被有心人珍存，在上世纪80年代重修时有所参照，终于得以以历史原貌呈现给后人。

直到今天，前来瞻仰的内地游客看到这座民国墓园“原汁原味”的样子，仍感到惊讶。近两年受邀前来参加迎接缅甸远征军阵亡将士忠骸归国活动的台湾国民党领导人蒋孝严、吴伯雄等初次踏访此地，也为之感叹不已，并称赞大陆方面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和胸怀。这一切，首先得益于腾冲人三十年前的历史担当。

因为地处极边，腾冲长期以来不为内地所熟悉；即便领略了那里的火山温泉湿地等神奇自然景观的人，也不一定了解那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腾冲，家家户户都供奉着“天地国亲师”的牌位，以及自明朝戍边来到此地之前的籍贯郡望。近年来，媒体称腾冲为“一部散落在边地的汉书”，是“中国人的心灵故乡”，只有亲临此地，才能体味到它的内涵。

如今，在腾冲人的心目中，埋葬在国殇墓园的英烈是死去的祖先，战后流落在当地的抗战老兵是活着的祖先。腾冲人正以无比的虔诚和恭敬，尽着那份孝道。

一场正义的审判

□ 张允强

9月2日，辽宁省档案馆筹办的《辽宁人民抗日斗争史实展》在沈阳浑南新馆开展。一系列档案相继公布，有力地揭露了日军侵华时期犯下的滔天罪行和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

在展出的200余件档案和图片中，一份名为《国民政府东北行辕审判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尤为引人关注。判决书中记载“民国21年9月16日由日本守备队防备队及宪兵警察等，将平顶山居民约2800余人进行屠杀并将全村焚毁”等的犯罪事实，这也为当年日军制造抚顺平顶山惨案、在华屠杀提供佐证。

据了解，1945年11月6日，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以秦德纯为主任委员的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并相继在各地逮捕和审判日本战犯。不过对于这次审判，辽宁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既有伸张正义、惩处元凶的一面，又有敷衍民意、虎头蛇尾，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当时国民党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其中，对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成为这次国民党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最大的败笔。又如，东北行辕法庭的工作，始终没有真正展开。东北是日本侵略时间最长，日军犯下的罪行数量很大的地方。对日审判开始后，战争调查委员会到东北搜集证据。1946年10月16日，战犯处理委员会东北督导组组长邹任之少将到上海，向各界揭露日军侵占东北14年所犯罪行。他列举了几项重大事件：1934、1938年“东边道”大讨伐，1935年敦化地区大扫荡，日军残杀抗日武装和百姓数千人。还有日军制造的抚顺平顶山惨案和万宝山惨案，都是震惊全国的屠杀国人事件。调查组还揭露了大连日本“关东州”警察局档案中对中国人的抓捕和酷刑，以及在东北经营贩毒等罪行。这些罪行，本应由东北行辕军事法庭审理。但是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后，将几十万日本“关东军”战俘押往远东。1945年12月4日，战犯处理委员会请外交部照会苏联政府，请求引渡日本战犯，但苏联方面未予受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才将东北地区日本及伪满战犯引渡回中国，1956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的特别法庭进行审判。

在沈阳，提起北陵电影院，几乎尽人皆知，但要说“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旧址”，知道的人却并不多。这个曾被改造成电影院的建筑物，如今的新名字叫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陈列馆，亦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分展馆。

军事法庭旧址是一幢古代风格斜檐闷顶的两层小楼。金色琉璃瓦，大红油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走进法庭大门，内部装饰也尽可能复原当年场景，如吊灯、雕花窗格等，带有上世纪50年代的历史气息。

陈列馆以复原当年审判场景为主，审判席、被告席、公诉人席、证人席、辩护人席，均按照当年陈设布展。

这座建筑始建于1954年，当时为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的俱乐部。1950年7月，根据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的规定，中国开始正式接受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的侵华日军中被苏军俘获的近千名日本战犯。这些战犯移交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4年1月，中央决定审判这批日本战犯。

为了审判日本战犯，1954年1月，中央从检察、公安、中联部等系统抽调了350多人，组成侦讯队伍。中央决定成立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主任李甫山任团长。1954年3月，东北工作团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侦讯工作。原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郭春来就是这支侦讯队伍中的一员。据老人回忆，侦讯工作有两大难关：一是手头掌握的证据少，二是日本战犯顽固不化。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反驳他们、让他们低头认罪，真是难于上青天。于是，工作团开始进行艰苦的调查取证。一方面是内调，到东北四处调取档案和文件；一方面外调，奔赴各地寻找人证物证。

从各地调取的罪证材料非常多，种类庞杂，有伪满报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如山的铁证面前，战犯们的思想堡垒崩溃，开始供述他们的滔天罪行。

缜密的侦讯工作为审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当时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起步，刑法、民法、诉讼法等等都未来得及制定，只有一部宪法。于是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决定，并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56年6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首先在沈阳开庭，对铃木启久等8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次审判，就是由袁光担任审判长。法庭出示了大量的物证，并传召包括日本下级官兵在内的许多证人出庭作证，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这8名日本战犯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在连续几天的庭审中，证人们饱含血泪的控诉，战犯们令人发指的罪行，使法庭的气氛整日笼罩于巨大的悲愤和压抑中。旁听的代表们和参审人员，经常是饮泪而泣，满堂唏嘘。

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8名被告人一一低头认罪，愿意诚恳接受法庭的正义判决。经过3天评议后，在19日上午8时30分开庭宣判：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铃木启久等8名战争罪犯有期徒刑二十年至十三年不等。

在沈阳开庭审判后，特别军事法庭6月10日至19日、6月12日至20日分别在太原审判了两个案件：一个案件是富永顺太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另一案件是城野宏等8人战争犯罪和反革命犯罪案。

特别军事法庭又于1956年7月1日至20日在沈阳市开庭审理了武部六藏等28人战争犯罪案。

为了核实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日本战犯的罪行，前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被要求出庭作证。

时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东北分校教员的权德源在法庭上做材料整理等工作，今年83岁的权德源老人回忆当年法庭内外的具体情景，仍感觉历历在目，审判被告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时，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溥仪长得细高、长脖子、戴黑框眼镜、穿一套犯人穿的蓝色衣服。他在证人席上站稳之后头一句话是“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汉奸爱新觉罗·溥仪”，之后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书面材料，揭发控诉伪满洲国最高权力机关总务厅的罪恶和被告古海忠之的滔天罪行。

7月20日，法庭对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28名罪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至十二年不等。

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国际社会审判日本战犯的延续，也是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总结。

自豪感从哪里来

□ 郝旭光

《东京审判》讲述了二战结束后，中国法官梅汝璈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艰难斗争的历史场面。从1946年5月开庭，庭审817次，持续到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历时两年零七个月，最终把东条英机等7名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

看完这部影片，让人不能忘怀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二战期间所遭受的空前、罕见的磨难；让人们记住的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做出的无可比拟的牺牲和巨大的贡献；更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我们不仅有能力、有智慧把侵略者赶出去，我们还有能力、有智慧把罪大恶极的战犯送上绞刑架。最后这一点才是爱国主义教育应有的题中之义——民族自豪感和荣耀感。

因此，优秀的抗战题材剧的标准是，能激起国人的自豪感、荣耀感！爱国主义培养的基础和内涵应该是培养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耀感，而不是被可怜。所谓的民族自豪感不是自己在家里自说自话，盲目自信，那充其量只能是自卑感引发的盲目。而自豪感是，不仅让本国人民振奋和自豪，也要让其他国家的人们从中感受到一种不得不佩服的力量、一种又敬又怕的力量！敬，是我们要变得强大，不可战胜，是我们在还不强大时永不言败，视死如归，团结，自我牺牲，民族大义等；怕，是其他国家不敢觊觎我们的土地、资源，只要侵略者胆敢来犯，坟墓、审判台、绞刑架和历史的耻辱柱就是他们的归宿。

我们要让侵略者敬畏，我们热爱和平，但我们绝不怕强权和侵略。首先要他们根本就不敢对我们有邪念。万一胆敢侵占我们的土地，我们会在战场上毫不留情地把他们打垮，这是物质基础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我们还要有足够的能力、智慧、资源在战争结束后把战争罪犯送上审判台，我们还能够运用智慧、法理、法律、逻辑、证据让他们低头认罪，从精神上摧垮他们；最后，把战争罪犯送上绞刑架并且牢牢钉在人类文明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不仅在战场上不可战胜，我们还占据着公平和正义的制高点。

那么，我们有没有这种物质基础？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有很多值得自豪的东西，我们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的主战场，是东方抗击日军的主战场。我们是战胜国，这一点毋庸置疑，其历史记录是在密苏里号战舰的受降仪式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接受了战败国日本的投降；在东京审判中，最终让战犯“死得明白”。即使在其他战场上也有许多让我们自豪的事实：我们有抗战首胜的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抗战初期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万家岭战役，第一次整建制地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师团；还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战役，如台儿庄战役、石牌之战、黄土岭战役、百团大战、缅北会战、夜袭阳明堡机场以及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爱国主义教育中民族自豪感的培养，不是喊口号、说空话、搞宣传就能有效果的，而是要通过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般地表现出来。

培养民族自豪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础，任重而道远！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读者服务窗：dzzs@ced.com.cn 010-58393509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定价：每月24.75元 每份：1.00元 广告许可证：京宣广0044号 广告部：58392178 发行部：58393121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2:55 印完时间：4:00 本报印刷厂印刷